



复旦剧社与中国 现代话剧运动

杨新宇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复旦剧社与中国 现代话剧运动

杨新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杨新宇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传统研究书系·乙种)

ISBN 7-5633-5982-6

I. 复… II. 杨… III. 话剧—戏剧史—中国—现代
IV. 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88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丛书总序

复旦大学中文系自 1925 年建系,悠然八十,人才辈出,自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一批在国内外学术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教书育人,薪火相传,创建了许多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形成了有特色的学术流派。同时,复旦大学的校园文化也有悠久历史,复旦诗社、剧社等文学团体为新文学运动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现经中文系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编辑一套研究丛书,在学理层面上总结探讨复旦中文系著名学者的治学经验和特色学科、文学社团的历史传统,以求弘扬复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各个学科的建设,并以此纪念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和中文系建系八十周年。

本丛书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本《名师名流》为著名学者的研究专辑。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系以来,拥有许多杏坛名师、学术名流,他们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大旗,追求无所羁绊的学术境界,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先生,有诗文并茂才华横溢的刘大白先生,有自称不京不海不江湖的陈子展先生,有清华国学院的传人蒋天枢先生,有学者、编辑、翻译家兼于一身的赵景深先生,有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洪深先生,有著名新文学作家和翻译家夏丏尊,靳以,方令孺,谢六逸等先生,是他们开创了思路开阔、学风活泼、新旧相济、研究创作并重的中文系学术格局。1950 年代全国院系调整,中文系受惠多多,与整个复旦大学一样,聚集一大批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风云际会,开创了复旦中文系历史上最好

的学术局面。这其中陈望道教授之于中国语法修辞研究、郭绍虞教授之于古代语言文学和批评史的研究、朱东润教授之于古代文学和传记文学的研究、陈子展教授之于先秦文学和近代文学史的研究、王欣夫教授之于文献书目学研究、吴文祺教授之于古代汉语研究、赵景深教授之于戏剧和通俗文艺研究、张世禄教授之于古代汉语史研究、蒋天枢教授之于清代学术研究和《楚辞》研究、刘大杰教授之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等,形成了中文系“十老”的语言文学治学传统,皆是代表当时的学术水平。半个世纪风雨路,江山代有才人出,1980年代以来,中文系在“十老”治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语法修辞研究等特色传统,建立起几代专家学者组合而成的学术梯队;同时,贾植芳教授为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建设奠定基础,胡裕树教授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蒋孔阳教授在西方美学研究领域都有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因此,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进行研究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乙种本为对复旦大学文学社团和复旦中文系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传统的系列研究,其中包括“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复旦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研究”、“复旦中国文学史传统研究”、“陈望道对复旦语法修辞学科的贡献”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复旦剧社是全国话剧领域颇有盛名的话剧社团,它在洪深、朱端钧等前辈戏剧家的领导下,对中国现代话剧运动曾做出过较大的贡献,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历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研究的强项,不仅编著出版多部有影响的文学史、批评史的著作,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学科传统,形成了较为强势的学术梯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陈望道先生所著《修辞学发凡》是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复旦的修辞学研究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学科。

上述专题研究的论文作者,基本上是中文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授予项目,每位作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指导老师,给予具体指导。这些论文的作者都能做到认真查阅、收集资料,对所承担的课题做深入研究,在学理层面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尽管这些见解未必都很准确,学术水平也高低不齐,但其分析评述有理有据,

有些论文还提出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学术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他们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前辈学者的人格精神和治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值得认真学习和继承借鉴。

从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确定选题到招标确定作者,从完成论文写作到编辑丛书出版,时间有两年左右,但由于经验不足,整个工作仍然处于比较紧迫的状态下面运行。其中有几个选题因为完成得不够理想而不得不暂时空缺。陈望道教授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者之一,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且对中国语法修辞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丛书乙种本专门收入《陈望道对中国语法修辞研究的贡献》一书,有详尽论述,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故而在甲种本的简易传论里未予收录,特此说明。整个工作中,由于时间迫切,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该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郑纳新先生花了大量的心血,为的是及时赶在复旦校庆前出版。在此也表示衷心感谢。

陈思和 周斌

2005年8月

目录

CONTENTS

丛书总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复旦剧社的时代坐标 ·····	11
第一节 现代话剧的传播 ·····	11
第二节 复旦剧社的起点——爱美剧的时代风潮 ·····	17
第三节 洪深与复旦剧社 ·····	26
第四节 复旦剧社与其他爱美剧社的比较 ·····	33
第二章 复旦剧社的演剧历程 ·····	42
第一节 爱美剧运动中的复旦剧社 ·····	43
第二节 左翼戏剧运动中的复旦剧社 ·····	72
第三节 经典戏剧的演出 ·····	79
第四节 抗战戏剧时期的演出 ·····	89
第五节 抗战胜利后的演出·····	103
第三章 复旦剧社的主要演剧倾向 ·····	108
第一节 初期的唯美感伤剧·····	109
第二节 改译剧的文本策略·····	113

第三节 喜剧的偏好·····	119
第四节 知识分子题材的重视·····	126
第四章 复旦剧社的话剧史地位 ·····	133
第一节 学校戏剧的历史地位·····	134
第二节 名剧的首演·····	140
第三节 对剧运的积极参与·····	144
第四节 戏剧人才的培养·····	159
结语 ·····	164
附录一:复旦剧社演出年表(1925年—1949年) ·····	168
附录二:建国后复旦剧社的主要活动 ·····	178
参考文献 ·····	187
后记 ·····	196

绪 论

复旦剧社作为在现代话剧运动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业余戏剧团体,虽然仅是一个校园社团,力量不算强大,剧社成员也每因学生毕业离校而不断变换,但却搬演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外剧目。为西方戏剧文化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起了桥梁的作用,为一批原创剧目提供了舞台,探索了新的演剧手法和演剧体制。与同时期的进步话剧运动同幅振动,并以具体的演出活动参与到左翼戏剧运动和抗战戏剧运动中去,而且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话剧艺术家,如马彦祥、朱端钧、凤子等,他们或擅长理论,或擅长导演,或擅长表演,均在话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吸引了一批著名话剧艺术家加入到复旦剧社的工作中,如应云卫、余上沅、袁牧之、欧阳予倩、王莹、赵丹等。尤其是在复旦剧社成立初期,剧社得到了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的洪深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复旦剧社作为一个大学生业余戏剧团体,在话剧运动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它的起点甚高,才形成了复旦大学的话剧传统,从而使自身得以长久存在,不断发展,延续至今,经历了各种思潮、社会变动的影响,成为见证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说它典型,不但因为它的演出成就不小,而且因为它也有自身的特色,比如它依托于复旦大学这样一个著名学府,而且存在于上海这样一个特别的城市。

一、复旦剧社成就概貌

1925年,复旦大学一些热爱戏剧的同学发起成立了复旦新剧团,

延请在复旦任教的洪深担任指导。也许这些剧社的创始人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创立这样一个“爱美”的演剧组织会在现代话剧运动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会长远地存在下去,他们只是受当时风起云涌的学校剧团的鼓舞,受演剧热情的触动,正巧因在上海戏剧协社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引起轰动而名闻遐迩的洪深于1923年来到复旦任教,如此近水楼台的机会便促成了复旦新剧团的诞生。复旦新剧团成立后,最初进行了六次公演,所演剧目多是当时颇为有名的独幕剧,以及复旦同学自己创作的习作,进行演出的场所也和其他学校剧社一样,都是在校同乐会及校庆纪念会上进行演出。这六次公演,可以作为复旦剧社演剧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洪深因忙于上海戏剧协社的演出事务,没能亲自为剧社排戏。其间,被称为洪深大弟子的马彦祥参加了剧团,鼓起了努力于戏剧运动的决心。在1926年秋复旦新剧团改名为复旦大学复旦剧社,简称复旦剧社,延续至今。

1928年春,洪深亲自为复旦剧社排戏,从此剧社有了一番新气象,开创了复旦剧社爱美剧演出的第二个时期。到1931年,复旦剧社演出了《女店主》、《寄生草》、《西哈诺》、《说谎者》等由洪深、朱端钧精心选择的几出外国大戏,或是改译,或是翻译,并经洪深的要求进行了社会公演。正是这几次成功的演出,奠定了复旦剧社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1930年,复旦剧社还与上海戏剧协社、南国社、辛酉剧社等,会聚起一个演出外国名剧的高潮。此外,易卜生的《娜拉》和《群鬼》、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凯泽的《煤气》等名剧也曾筹划演出,但因为业余剧社的实力毕竟有限,而未能实现。当然,作为学校的精品文艺团体,复旦剧社在戮力于演出外国大戏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仍然付出一部分精力支持校园内的游艺活动。

1930年代,复旦剧社又积极投入了左翼戏剧运动的联合开展,并以《五奎桥》的具体演出在左翼戏剧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奎桥》作为左翼戏剧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演出,在现代演剧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之后,复旦剧社又排演了《琼斯皇》、《委曲求全》、《雷雨》等大型剧作,显示了独到的眼光,尤其是1935年12月《雷雨》的演出,第一次将《雷雨》带给上海的观众,在曹禺剧作的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

意义,复旦剧社的成功演出为上海观众接受《雷雨》奠定了基础,开始了《雷雨》经典化的历程。受此激励,演出《雷雨》的同学于毕业后成立了“戏剧工作社”,联合校内复旦剧社的同学,再次演出了曹禺的剧作《日出》,成为《日出》问世后的首演。1936年,在国防戏剧的倡导中,复旦剧社也积极响应,认真排练了《阿比西尼亚的母亲》、《母归》和《汉奸的子孙》,但在演出当天,却被上海教育局禁演。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的炮火炸毁了复旦园,复旦大学大部分师资向内地迁移,而小部分则搬到赫德路的一幢小楼里。随着学校的分部,复旦剧社也分散了力量,大部分社员随着学校迁到重庆,少部分人则留在上海。而重庆的复旦剧社与上海的复旦剧社均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坚持着演剧活动。一个小小的剧社竟然也因战争被分成了两个,但这两个分部,恰恰成为蓬勃开展的国统区演剧运动和艰苦卓绝的沦陷区演剧运动的两个缩影,成为见证现代话剧运动史不可多得的典型。重庆的复旦剧社,先后演出了《古城的怒吼》、《凤凰城》、《国家至上》、《雾重庆》、《寄生草》等大型抗战剧作,在与青年剧社合并为复旦话剧社后,又排演了《北京人》。抗战时期是话剧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复旦剧社作为业余剧社的演出在其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复旦剧社仍为抗战戏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古城的怒吼》更设法打进了重庆最大的剧场“国泰大戏院”演出。留在上海的复旦剧社,也积极参加了“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的业余戏剧运动,在“孤岛”时期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是参加了1939年7月间在黄金大戏院举行的由十一个业余戏剧团体参加的“义卖”公演,其中复旦剧社演出了《生死恋》。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积极策动内战,全国逐步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而学生运动则是其中核心部分。对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以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的形式来参与社会运动是最好的选择,既合于他们的身份特点,又容易引起广大群众注目。因而这一阶段复旦剧社的演出活动带有明显的“广场戏剧”的特点。1947年2月,上海劝工大楼惨案发生后,复旦剧社赶排了活报剧《梁仁达之死》,在为梁仁达家属募捐的晚会上演出,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复旦剧社成立于爱美剧运动的时代风潮中,这就决定了它的业余

性质,在成立以后的历次演出中,尽管也曾得到专业戏剧家的指导,在戏剧艺术上有相当的努力和创造,但一直是以业余剧社的身份出现在话剧运动中的。业余剧社的性质显然制约了复旦剧社的发展,它的规模不可能很大,实力也不会太过雄厚,优秀演员的舞台经验以及舞美上的创造等也因社员毕业离校而流失,否则以复旦剧社在各阶段众多的优秀演员的合力和长期的艺术积累,将会创造出更加突出的成就。然而也正是这种业余性,使得复旦剧社得以长期存在下去,它不需要任何运营费用,不计较演出收益,只以艺术的高下为其目的。复旦剧社作为业余剧社而能成功演出众多的优秀剧目,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它因此成为学校业余剧社中成绩最显著者也就顺理成章了。一般而言,业余剧社由于人员的不固定,演出的业余性,很难像职业剧团如中国旅行剧团等那样形成带有明显连续性的演剧倾向,它们演出的剧目多少带有随意性,演剧的倾向可能不太明显,复旦剧社自然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特点。然而由于复旦剧社在前期有洪深的倾力指导,以后又受到时代进步思潮的深刻影响,因而复旦剧社的演出仍然有较清晰的脉络可循。如果要为复旦剧社的演出划分阶段的话,是完全与现代话剧史的进程相一致的,始终追随着时代的进步潮流,没有也不可能逾越,但由于参加者都是大学生,也会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的演剧偏好。

对于这样一个在现代话剧史上坚持演出最久,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生业余剧社,系统、全面地研究它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但有助于现代话剧运动研究的全面和深入,而且有助于揭示业余话剧团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话剧传统不够牢固的中国社会的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探询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有一定的启示。

二、话剧社团研究的现状和话剧社团研究的局限性

“在现代影视艺术出现以前,艺术家族主要有两类成员,其一是单媒介艺术,比如语言艺术(文学)、声音艺术(音乐)、身体艺术(舞蹈)、色线艺术(绘画)、物体艺术(雕塑、建筑)等;其二是综合媒介艺术,比

如歌是文学与音乐的综合,戏剧是全部单一媒介艺术的综合。……戏剧虽集各单媒介艺术之大成,但囿于舞台,碍于演出,其综合效果的发挥与传播都大大受限,而文学,能说、能听、能写、能读足矣。”^①类似的论述在学术界并不鲜见,可见对于文学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可把握性,而戏剧则比之复杂得多,作为文学部分的剧本即使可以分析透彻,但这只是戏剧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远非戏剧研究的全部。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话剧的研究也就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以剧本创作的研究为主,一条以舞台演出的研究为主,这也是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相关联的。主要研究力量前者以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为主,而后者以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及有关艺术研究院为主。在话剧史写作方面,各自的代表性成果即:南京大学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两者树立了完全不同的写作体系,前者以话剧文学的发展史为中心,兼带论述了诸如洪深、田汉等著名戏剧活动家的演剧实践,对于导演制等演出实践方面的突出进展在必要时也有所提及,但对于大量外国戏剧的演出却不作记述,后者则以话剧运动为线索,只对曹禺等重要作家的创作才做专节论述。这两部著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也就各有短长,但就话剧的发展历程而言,既然话剧是公认的综合艺术,而又以剧本为基础,那么对话剧史的研究当然既要重视剧作家的创作,又要肯定话剧的演出活动也是话剧史的研究范畴,不妨既有话剧文学史,也有话剧运动史,作为话剧运动重要组织的话剧社团的活动,理应成为话剧运动史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话剧社团的研究十分欠缺,除《中国话剧通史》、台湾吴若、贾亦棣著的《中国话剧史》以史的线索对各阶段各话剧社团的活动进行了一番梳理外,最多见的便是戏剧运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但关于话剧社团的专门性论述却极为少见。目前话剧社团中研究最多的是中国旅行剧团,有洪忠煌著的《中国旅行剧团史话》,但主要仍是历史史实的考证和描述,上海戏剧学院的硕士徐珺撰写了《中国旅行剧团:现代职业话剧的拓荒者(1933—

^①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1947)》，是一篇以话剧职业化趋势为立足点，研究中旅的学位论文。即便像南国社这样以田汉为主导的，既是演剧团体，同时又是带有文艺创作性质的团体，在学术界对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之类文学社团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的情况下，仍然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南京大学文学学院的胡静博士正在撰写关于南国社的博士论文，而艺术剧社之类的革命戏剧团体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文章多数仍是史实性描述。对于业余话剧团体的研究则成果更少，有人对南开新剧团做过较详细的资料收集，作为南开悠久校史的补充，但关于南开新剧团的研究文章也很少。话剧社团研究呈现出来的不深入现状，无疑与话剧社团研究的局限性有关，这种局限性正是戏剧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严格地讲起来，批评一个剧本，应当根据台上的表演，不应当根据纸上的文字；因为一个剧本必须在舞台上实现之后，才能算是完整的艺术作品的。但是，不幸得很，舞台上的成绩，是没有法子保留的；在上演时所给予观众的印象无论如何深刻，等到日子久了，渐渐地总会是磨灭了的；反而不如那写在纸上的东西，能够传之久远。同时，一个实践的戏剧者所有的好处，也决不是那些没有看见过他的舞台工作而仅仅阅读他的剧本的人，所能完全晓得的。”^①而舞台上的表演又有着一次性的特点，“同一剧本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演法，而同一演员又没有两次绝对相同的表演。戏剧是永远生动着——在舞台上生动着的。一首诗，或是一幅画，作成之后，便即固定。戏剧则不然，每一次在舞台上表演，每一次都是个单独的创造”^②。马丁·艾思林也说：“戏剧是最具有社会性的艺术形式：就它的性质本身来说，是一种集体的创造；因为剧作家、演员、舞美设计师、制作服装以及道具和灯光的技师全都做出了贡献，就是到剧场看戏的观众也有贡献。戏剧的文字部分即剧本，是一个固定的永久存在的实体；但是剧本的每次演出的效果是不同的，因为演员对不同的观众的反应不同，当然对他们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反应

① 洪深：《现代戏剧导论》，《洪深文集·第四卷》第5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6月版。

② 余上沅：《戏剧艺术的困难》，《戏剧论集》第138页，北新书局，1927年7月版。

也有所不同。”^①这些论述无不表述了现场演出的重要性。话剧社团作为话剧表演的团体,正是与舞台艺术实践紧密相关的,然而现场演出的成就又是很难用文字表现出来的。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对以往剧社的研究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傅谨对于浙江草台戏班的跟踪式研究,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与此性质不同,另当别论。

即便是录像技术发明之后,虽然能够复制出演出的原貌,但也只有单一的摄影角度,对演出的记录仍不全面且戏剧的场效应已荡然无存。更何况中国现代戏剧史,除去一些京剧名家的唱段,可能完全没有保留下话剧演出的影像资料,这为现代话剧运动史的研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面对历史已无法复原的局面,话剧运动史的研究还是否成为可能?尽管剧社的活动无法完全复原,退而求其次,对于剧社与现代话剧运动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仍然可以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是进行话剧社团研究比较可行的切入角度。话剧的演出情形和社会反响好在当时的报纸期刊上还有着相当的记载,自然,报纸期刊的文字记载与鲜活的影像是无从相提并论的,况且文字记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演出的实况呢?每个人的记录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剧感受,演出是每个人眼中的演出,很难体现出客观性,何况同一场演出不同的报刊有时还会给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是否赞扬的文章多出于朋友的捧场,也已很难判定。然而报纸期刊毕竟是作为唯一能够贴近当年话剧运动的资料,即使存在这么多不足,也仍然是治话剧运动史者的必需参考资料,各时期演出剧目的选择仍可见出话剧运动的轨迹,当然对材料的详加辨析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有人所说:“对任何历史过程的再现都只能依赖于现有的有关材料,而对这些材料的选择,组合,理解和运用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再现更与一般文学研究大相径庭。戏剧作为一种舞台形式不像以文本为形式的文学作品,它作为研究对象只存于演出过程之中,具有强烈的直接性,当下性和瞬时性,后人研究戏剧的根据只能是对演出的直接和间接记录,

① 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第2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罗婉华译。

即戏剧的痕迹而已,如剧本、导演手册、舞台模型、节目单、剧照、海报、演出报道、剧评、书信、日记、回忆录、传记和理论文章等,即使是现代技术手段如录像也只是一种信息量比较丰富的痕迹而已,因为它已经从戏剧式的双向交流变成了电影式的单向灌输。这些痕迹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记录者的主观取向,甚至有时还有真伪问题……当再现者使用这些材料时等于在主观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主观的运用,很难逃避可信度的追问。不过再现的困难不等于再现的否定……获取真实的材料并不是不可能,尤其重要的是直接材料……”^①更何况,就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史而言,上演过大量剧目,其中许多是改译或翻译剧本,本是话剧运动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这些演出剧目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散落在报纸刊物和相应的出版物里,仍然需要耐心去发掘,才可描摹出现代演剧的运行轨迹,即便是一些原创作品的演出,一些非名家的作品甚至很有特色的作品亦未得到很好的搜集,这仍然需要深入到报章杂志中去。就目前现代话剧的研究状况而言,现代阶段演出的许多重要剧目根本没有得到整理收集再版,当时上演的剧目内容如何许多学者都没有弄清,话剧史的版图划分存在着许多大而化之之处,因而报章杂志仍是研究话剧运动的重要史料。南京大学董健主持编撰了《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从报章杂志等出版物中发掘整理出许多被湮没的剧目,成果完成后,董健惊叹以往学术界对于现代话剧史的描述远远不够,并说《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已编完,“但‘与史相纬’的《总目提要》却迟迟未能完成。这在工作程序上是多少有些颠倒的”^②。可见话剧史料的搜集整理对于现代话剧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就复旦剧社的演出而言,其中如《寄生草》、《说谎者》等改译剧目,经由复旦剧社演出后,又被其他剧团广泛演出,成为现代阶段影响极大的演出剧目,然而1949年以后再没有出版过,它们曾经的辉煌迅速湮没,仿佛不曾存在过;其他如《女店主》等,读者虽可读到该剧的译本,但当年的改译本面

① 王建:《论布莱希特对梅兰芳的误读》,《欧美文论研究》第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② 董健:《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貌如何却又不得而知了。所以仍需要把它们从图书馆的书库里查找出来,才可部分复原当年演出的历史。

关于复旦剧社的研究,则尚无专门性的论述,甚至演出资料搜集整理的工作也没有进行,但对复旦剧社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地位的肯定却在多部戏剧史研究专著中有所体现。早在1938年出版的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就对复旦剧社的戏剧活动做过较详细的介绍并给以高度的评价,新时期以来现代话剧史的著作《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话剧通史》等对复旦剧社的演出状况均有所涉及,尤其是以话剧运动为线索的《中国话剧通史》对复旦剧社各阶段的活动都一一列举,评价亦甚高,但这些著作并非专门的话剧运动史或话剧社团的专著,所以复旦剧社这样一个小剧社只占有很少的篇幅,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剧卷”将复旦剧社作为一个词条收入,由原复旦剧社成员包时撰写,作为一个权威出版物,对复旦剧社的戏剧史地位作了肯定。此外复旦剧社作为复旦大学有着悠久传统的精品学生社团,校史资料如《复旦大学志》等也记载了复旦剧社的活动。1985年复旦剧社成立六十周年时,当时复旦剧社的成员傅红星、王一岩搜集整理了《复旦剧社六十年》的初稿,作为复旦剧社成员内部了解自己社团悠久传统的一册资料,但它们都非学术性专著,只能提供一些基本性史料的线索。

此外,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日渐成熟深入,其中也越来越关注一些著名高校的校园文学活动及校园文学社团的活动,如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学校的校园文学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或收集整理了作品集、资料集等。钱理群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北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东南大学与学衡派》、《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等,此外张玲霞也著有《清华文学寻踪:1919—1949》。而作为南方重要学府的复旦大学,对于其在现代中国阶段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做出的贡献还未见研究专著出版。西南师范大学的硕士李本东对于重庆北碚时期的复旦大学文学创作活动做过研究,2001年完成了《重庆复旦大学作家群的文学活动考略》的学位论文。而复旦大学面对自身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源,当然